

1906 — 1986  
庆祝暨南大学建校八十周年

# 东南亚研究论文集

(78)  
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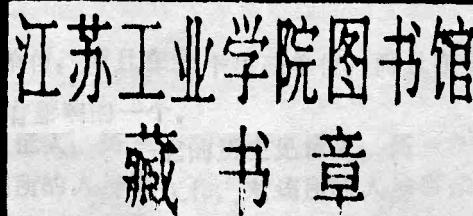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 RESEARCH  
JINAN UNIVERSITY

# 东南亚研究论文集

陈乔之 陈森海

主编

张乃坚 黄昆章



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

一九八六年 广州

## 序 言

赵 元 浩

今年是暨南大学建校八十周年大庆，又是本校东南亚研究所正式成立二十五周年。在这两个具有重大意义的日子里，东南亚研究所推出一批科研成果，作为纪念，这本论文集，便是其中之一。

在选编这本论文集期间，东南亚研究所邀我为这本集子写篇序言，我欣然从命，因为：第一，这是它首次出版的一个论文集，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我都应该热情地支持。第二，我对东南亚研究所怀有一种特殊感情，一方面我在暨大工作与暨大东南亚研究所历程，在时间上几乎一样长短，在这个意义上说，我也是它的历史见证人；另一方面，暨大在1978年复办初期，我曾一度兼顾东南亚研究所的复办工作，对该所的人与事都有一定了解。尽管后来我没有直接参与东南亚研究所的工作，但对它的发展情况仍然是关心的，并且还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替它办了一些事。

东南亚研究所不但是我校办得最早、规模最大的一个科研单位，而且在全国同类研究机构中，也是历史较长、规模较大、颇有影响的一个。

1966年以前，该所已初具规模，拥有一支40人左右的科研队伍，具备一批数量与质量均相当可观的图书资料和设备，在全所同志的努力下，出版了一份刊物，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学术资料，在当时全国东南亚研究领域中占居重要地位，受到各有关方面的重视。

然而，十年浩劫期间，东南亚研究所解散，人员改行，图书资料迁移散失，研究工作中断长达十余年。

1978年暨大宣告复办，东南亚研究所才获得新生。但毕竟已元气大伤，各方面均今非昔比。以人员来说，大批科研骨干流失，归队者不及“文革”前的三分之一；图书资料残缺不全，损坏严重，更可惜的是来自海外的图书资料因中断十余年而无法补全。同时，复办以来，由于经费不足、设备落后，办公条件差，以及其他种种原因，东南亚研究所迄今仍未全面恢复到“文革”前的状况。

尽管困难重重，但可喜的是归队科研人员与新来的同志，尚能加强团结，勤奋工作。特别是新任的研究所负责人，注意端正业务指导思想，勉励大家为开创本所工作新局面而努力。同时，一批中年科研人员，经过数年来的艰苦奋斗，目前已成为东南亚研究所的中坚力量，他们在开展学术研究和拓展对外横向联系，促进科研工作为教学和四化建设服务方面已经取得初步成效。1978年以来，东南亚研究所不仅恢复出版《东南亚研究资料》杂志，质量逐步提高。1985年该所还创办了《东南亚信息》报，取得一定的社会效益。一批中青年研究人员在科研工作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他们中有些同志的科研成果受到学

术界和领导机关的重视和好评。在条件较差时间较短的情况下，东南亚研究所的同志能够作出如此可观的业绩，实在来之不易，应该给予充分的肯定和公正的评价。

现在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论文集，就是在过去六、七年间东南亚研究所大量科研成果中挑选出来的一小部分。在这个20万字左右的集子里，我们可以发现两个显著特点：

一是广。全书收入21篇文章，题材相当广泛，所涉及的学科也很多，包括经济、政治、历史、教育、宗教、国际关系等等方面；在经济方面，又包含有部门经济、比较经济、涉外经济、国际贸易、国际经济合作关系等各个领域。

二是全。不仅涉及的学科比较齐全，而且举凡东南亚地区的所有国家（除文莱外），皆有一篇甚至多篇文章论及。

此外，有些文章题材比较新，观点比较新，写法也比较新，有一定的份量和深度。

这些都是令人可喜的。正因为本书内容比较充实、资料颇为丰富，对于读者从各个角度了解东南亚问题会有一定的启迪和帮助，所以我愿意把它推荐给大家。

诚然，由于东南亚研究所目前仍处于恢复元气的阶段，加上其他种种原因，本书中的某些文章还欠成熟，学术水平还不够高；有些文章则因发表多年，现在情况已有所变化，因此某些观点和材料难免有点“老化”。尽管如此，我还是认为，这是一本具有一定学术价值的论文集。

从总体上看，我国目前对外国问题的研究，包括对东南亚问题的研究，水平还有待进一步提高。暨南大学是一所面向海外和港澳台地区的高等学府，置身于这所大学之中的东南亚研究所原已有一定发展基础，还有许多尚未发挥的潜在优势，只要学校方面继续予以大力的扶持，社会上也能够更多地予以关心，加上本所人员进一步明确努力目标，把科研工作同教学与社会需要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那么，东南亚研究所将是大有希望的，将会在我国的东南亚研究事业中作出更多宝贵的贡献。

出版这本论文集，对于东南亚研究所来说，是一个良好的开端。我热诚地希望同志们继续努力，勤奋耕耘，在科研园地上开出更鲜艳的花朵，结出更丰硕的果实，出版更多具有更高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的论著。

# 目 录

论东盟国家对“环太平洋联合设想”的态度及其原因	陈乔之(1)
东盟国家初级产品贸易问题	張乃堅(9)
在印尼的外国投资初探	翁錫輝(19)
试论印尼的合作社	郑仁良(27)
新加坡炼油业现状与前景	王秀(35)
新加坡与香港经济起飞原因之比较研究	陈乔之(42)
马来西亚的对外贸易	郑煥宇(47)
泰国的林业	翁琳(54)
泰国旅游业	赵元浩(60)
菲律宾旅游业	彭天(62)
新加坡干部政策的研究	黃松贊(66)
战后英国对缅、马殖民政策比较	廖小健(76)
论七十年代菲律宾穆斯林运动	栗明鮮(86)
试论柬埔寨问题的发展趋势	刘永焯(94)
欧美印支难民及其社团组织	黃惠蓮(101)
试论侨民	蕭永堅(106)
孙中山、辛亥革命与印尼民族独立运动	黃昆章(115)
伊斯兰教在印尼	溫北炎(125)
泰国教育剖析及几点启示	林志鶴(132)
美国在菲律宾的教育政策剖析	陈超逮(141)
缅甸教育改革浅析	林錫星(149)
编后	(156)

# 论东盟国家对“环太平洋联合设想”的态度及其原因

陈 乔 之

“环太平洋联合设想”，是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大平正芳竞选日本自民党总裁时首次正式提出来的。在他上台之后，把它作为日本的基本国策和外交方针而加以推行。一九八〇年七月，铃木善幸继任首相后，表示赞同大平的“设想”，并继续予以推行。这说明，日本政府虽有更迭，但不会影响“环太平洋联合设想”作为日本既定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

所谓“环太平洋联合设想”，简而言之，就是要“用松散的关系”，把太平洋沿岸的国家联合起来，以便“在文化、经济方面进行合作”。①日本认为，实现这个“设想”，首先是要建立一个从事经济合作的“新区域社会”，加入这个“新区域社会”的对象，虽然包括所有太平洋国家，但主要是市场经济国家，首先是日本、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及东盟五国。在日本看来，按照大平“设想”建立的太平洋经济共同体，必须以日美合作为基础，五个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为主体，而东盟五国则是必不可少的基本成员。大平在澳大利亚的一次演说中，更提出实施这一“设想”的五项指导原则，即：1、以文化和经济合作为中心，不搞政治和军事两个领域的合作；2、不想建立坚实完整的机构，使之成为松散的联合；3、进行开放式的合作，不排除愿意参加的国家；4、需要得到包括美国在内的五个先进国家（日、美、加、澳、新）和东南亚国家联盟的合作；5、通过不受各国政府的方针束缚的民间协商机构予以推进。②日本把实施其“设想”的希望，首先寄托在五个太平洋地区的工业国家和东盟五国身上。在铃木前不久那次重要演讲中，也对东盟国家表示高度的重视和殷切期望。他指出：“东南亚国家联盟各国作为这个地区的重要核心，正在加强团结，走自主的发展道路。对于整个地区的发展来说，这是具有重大意义的。”

既然日本所提出的“设想”是有关“环太平洋联合”的问题，按照日本的“设想”，东盟国家在拟议的太平洋经济共同体中，还被当成必不可少的基本成员，这就使东盟国家非关心不可。同时，太平洋地区对于东盟国家的利益来说，也确实是十分重要的。在这里，有东盟初级产品的最大市场。除日本外，美国进口天然橡胶总数的百分之八十九、锡的百分之六十八、硬木的百分之二十八、石油的百分之六，均来自东盟国家。东盟国家的相当一部分劳动密集型工业品，也是销往本地区的发达国家；在这里，东盟国家也能够获

得最大量的开发援助、私人直接投资和技术转让。这些，决定了东盟国家必须关心日本这个“设想”。

表明东盟国家对日本“设想”的关心的突出例子是一九八〇年一月十一至十三日在印尼巴厘召开的一次讨论会，这是一次由美日在幕后支持，以东盟政界、财界、学术界人士为主体，并有日、美、澳等国同行共一百五十多人参加的大型讨论会，也是专门研究有关太平洋经济联合问题的讨论会。马来西亚的马哈蒂尔（当时任副总理兼贸工部长）、新加坡的吴作栋（当时任贸工部长）、菲律宾的西卡特（国家经济发展署署长）、印尼的维耶素（矿物及能源总监）等部长级高官出席会议并发表演讲。其后半年多，在澳大利亚堪培拉召开了关于“太平洋合作”学术讨论会，东盟各国也派出一批政府官员、企业家和专家学者出席，泰国副总理他纳·科曼出席并发表演讲。

但是，东盟各国的实质性态度又是如何呢？综合东盟五国官方人士讲话及报界评论，我们可以看到，尽管他们所使用的措辞不尽相同，表达方式有所差别，但都从本质上反映了他们对日本的“设想”，即建立太平洋经济共同体构想的共同看法和态度。归纳起来就是：1、不反对发展太平洋地区的经济合作关系；2、对于这种“更大的区域性合作”能否给东盟国家带来平等互利表示疑虑；3、对于本地区的发达国家是否通过建立这样一个共同体而使不发达国家重新接受它们的“主宰”和“控制”保持高度警惕；4、主张按照东盟组织的模式与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准则来建立太平洋经济共同体。除了经济上的担忧之外，东盟国家还害怕会不会由于加入这个共同体而介入大国竞争旋涡，使自己的安全与稳定受到威胁。泰国科曼副总理曾经直截了当地说：“小国担心被一些大国拉到一起，结成联盟，去反对另一些国家”。③

总之，东盟国家在对待“环太平洋联合设想”的问题上，感情是错综复杂的，内心是充满矛盾的，态度是模棱两可的。日本东京大学佐藤教授一针见血地指出：“东盟国家担心的是，它们有可能既处于华盛顿的军事压力之下，又处于日本的经济压力之下。”④

东盟国家对于建立太平洋经济共同体构想的疑虑和忧心，首先是出自对日本的不信任感。而对日本的不信任感，由来已久，既有历史的原因，又有现实的缘故。

从历史上看，在第二次大战期间，日本为实现其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迷梦，不惜把侵略战争强加于远东各国人民头上。正如日本报纸所指出，自从日本提出“环太平洋联合设想”，东盟国家就有人认为这“是战争期间的大东亚荣圈设想的复活”，“担心日本可能企图取得主导权”。⑤

六十年代以来，东盟国家相继制订本国经济发展战略，实行积极引进外资的政策。日本利用它在五十年代战争赔偿期间与东盟国家取得一定谅解的机会，进而在经济合作的名目下，向东盟国家提供贷款和投资，以打进“经济的楔子”。从战争赔偿到“经济合作”，日本的目的不外是：1、在政治上“构筑从日本经台湾、菲律宾、新加坡直至印度尼西亚的反共防波堤”，为美国当时在亚洲推行冷战政策效劳；2、在经济上，则为日本重返东南亚铺平道路，使东南亚取代战前中国的地位，成为“日本资源供应地和最重要的市场”。

由于日本所醉心的是实现上述目的，为自己牟取利益，所以在与东盟国家进行“经济合作”之中并不关心和照顾对方的要求和实惠，特别是“对南北间的差别都不予重视，甚至熟视无睹”，致使“以日本为首的工业发达国家的经济援助和合作，开设企业和投资，不仅没有产生发展中国家所期望的效果，而且扩大了贫富的差别”，因而引起东盟国家“从各个角度对日本经济合作状况进行了批判”，且在一九七四年一月田中角荣前相访问东盟期间，各国竟掀起声势巨大的反日浪潮。⑥

日本的“环太平洋联合设想”是在田中下台与大平上台之际提出来的，此时东盟的反日浪潮虽已平息，但是历史上的战争创伤及现实中日本作为“经济动物”的唯利是图本性的暴露，以及某些日本人在东盟国家中令人憎恶的高傲自负和盛气凌人的言行，都使东盟国家对日本的不信任感有增无已。诚如台湾一位学者所说：东盟国家对所谓经济大国日本是否具有“经济侵略”或“新殖民地残余”潜在行动，早已存有戒心，“加上新兴国家民族自尊心特别强烈，与气度狭窄、态度自负的日本人士长时接触，想保持情感上的平衡恐不是一件容易的事。”⑦有鉴于此，东盟国家在接触到日本提出的“环太平洋联合设想”时，不免产生条件反射，对于日本的动机和效果不能不表示深深的疑惑。

诚然，东盟国家对太平洋经济共同体构想所持的态度，归根到底还是由它所处的地位及利害关系所决定的。

一九八〇年九月在堪培拉讨论会束之后，会议主席、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校长克劳福特在介绍会议情况时，着重谈到：“东盟国家的与会者特别认为，太平洋共同体不得破坏东盟的力量和团结；不应暗地里包含有损不结盟政策的动机；不许搞新殖民主义；不得损害东盟同其它地区的重要经济关系，使东盟更加依赖工业大国或受它们的控制，而应使工业大国更多考虑到东盟的利益，特别是在贸易方面的利益；南北对话是发展中国家更大的利益所在，因此太平洋共同体不得在这方面采取分而治之的策略；不得破坏现有的地区性安排和多边安排等等。”⑧

东盟国家把维护和巩固内部团结作为参加太平洋共同体的第一个前提条件，是毫不奇怪的。因为，东盟组织的形成与发展，本身就是五国相互团结的产物。十余年来东盟国家的经济进步以及在国际舞台采取共同立场和政策，使它成为一个举足轻重的政治经济实体，这一切，靠的也是不断加强其内部团结。所以，团结是东盟组织生存与发展的根本保证。尤其是近年来国际政治、经济形势不断地向东盟国家提出新的挑战，加强内部团结，就更为迫切了。事实上，在对区内的经济合作方面与对区外的政治、经济关系方面，东盟国家之间并不完全是意见一致的，如果不先做好内部意见和政策调整工作，形成一个更为坚强团结的集体，而是把精力放在促进太平洋共同体的建立上，或者由于太平洋共同体的出现而影响以至破坏东盟的内部团结，那么东盟作为一个政治经济实体就将会被肢解，其力量便会涣散，其利益也将丧失殆尽。这对东盟国家来说，无异于舍本逐末。前不久，李光耀在东盟外长会议上，再次强调加强东盟内部团结的重要性。他说：“为了顶住外来压力和各种问题，东盟必须保持团结以增强集体力量，”“东盟必须要拒绝短期利益的引诱……以防由于团结的削弱和讨价还价力量削弱而带来长远的损失”。⑨这就进一步证明东盟国家最关心的是加强内部团结。

与加强内部团结同样重要的是本地区的和平与安定。东盟组织成立以来，一再主张把

东南亚地区建立一个“和平、自由、中立化”地区，这个主张反映了东盟国家和人民热爱和平和在安定环境下建设民族经济的迫切愿望。在一九七一年十一月的东盟外长会议上，通过了《东南亚中立化宣言》，声明五国“决心初步地进行必要的努力，来获取对东南亚作为一个不受外部强国的任何形式或方式的干涉的和平、自由和中立地区的承认和尊重”。越战结束后，一九七六年七月，另一次东盟外长会议也通过决议，一致同意采取紧急措施以便使建立东南亚中立区的主张获得广泛支持。<sup>⑩</sup>为了使东盟的主张得以实现，它们尽量避免卷入大国之间的纷争。在苏越霸权主义的威胁面前，东盟国家虽然一致行动，谴责苏越对东南亚地区和平与安全的严重威胁，但却严格执行不结盟政策。日本提出的“环太平洋联合设想”，得到了美、澳等发达国家的赞同和支持，而苏联却予以反对和指责。苏联报刊认为，这个“设想”是企图“在亚太地区拼凑为国际反动派服务的、关闭性的经济集团”，其矛头是指向苏联的，因此，苏联警告太平洋区域各族人民必须“密切关心持久的和平和可靠安全”，<sup>⑪</sup>实际上是号召太平洋沿岸国家的人民起来抵制太平洋共同体。所以，东盟国家从本身的处境和利益出发，对参加太平洋共同体会不会损害它们的不结盟政策，与它们的“和平、自由、中立化”主张是否相容，表示严重关切，采取谨慎态度，那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至于支持和参加太平洋共同体，会不会影响东盟国家与其他地区的广泛经济关系、会不会加强东盟对发达国家的依赖性从而导致发达国家对东盟的控制，能不能在贸易方面给东盟国家带来更大的好处，是不是有利于促进“南北对话”等问题，更是同东盟国家的利益直接相关，更不能不引起东盟国家的高度重视。

战后，由于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统治的结果，独立初期的东盟国家经济结构的畸形状况继续存在着。为摆脱这一状况，它们分别制订了实现工业化的经济发展战略。但是，它们发展工业所需的大量资金与技术主要来自发达国家。另外，原来作为东盟国家主要外汇来源的初级产品出口，以及利用外资发展起来的资本密集与劳动密集类型的工业品，也以西方发达国家为最主要市场。这两个方面，使东盟国家经济对西方国家的依赖程度一直相当高。因而很容易受西方经济的控制和影响。特别是七十年代以来，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严重，发达国家为了转嫁危机，进一步加强了保护主义措施，严重地阻碍了东盟国家原料及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例如，美国从新加坡、菲律宾进口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的贸易加权平均税率分别为百分之二十五点八和百分之二十二点六（世界进口同类产品的平均税率为百分之十七点二）。<sup>⑫</sup>发达国家还采取关税升级措施（即加工程愈高，税率愈高），限制发展中国家扩大制成品出口。这种关税升级措施阻碍了东盟国家及其他发展中国家加工工业的发展，增加它们对原料出口的依赖。

由于东盟国家在同日、美等发达国家开展经济贸易往来中，长期处于不利地位。它们在同日、美、欧等国家的对话中，一再呼吁它们正视东盟国家的合理要求和利益，但发达国家往往许诺多而行动少，东盟国家对与发达国家之间的不公平合理的经济贸易状况的不满情绪是强烈的。在太平洋经济共同体尚未成立之时，东盟国家已经经常受西方国家卡脖子，一旦进入这个“环太平洋经济圈”里，又将会受到怎么样的摆布，东盟国家不可能不有所顾虑。

为了摆脱发达国家的控制，减少对它们的依赖，近年来东盟国家日益注意发展同其他

国家和地区的经济贸易关系，尤其重视同第三世界国家进行广泛的经济合作。有人问印尼外长对印尼与日本的经济合作关系的看法，这位外长回答说：“印度尼西亚是有不满情绪的。正是由于这个缘故，我们已经开始同很多国家建立经济和贸易关系，……以便使这种关系多样化，我们并不想把我们所有的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日本里。”<sup>⑬</sup>马来西亚财政部长拉扎利今年七月在主持第十二届亚洲税务行政与研究组会议开幕式时，就非常明确地说：“鉴于发展中国家与西方发达国家的贸易关系受到限制，发展中国家在亚太地区必须加强合作，增加彼此间的贸易，鼓励在国家之间作更大的投资，……可加速发展中国家在本区域的经济发展。”<sup>⑭</sup>

东盟国家不仅日益加强与第三世界的经济联系，而且还积极参加以发展中国家为主导的各种世界性的原料生产国和输出国组织，积极推动和参加以“南方”国家为一方，以“北方”国家为另一方的“南北对话”，积极支持和参加改革旧的国际经济秩序、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斗争。通过这些活动，使东盟国家与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不断增强团结和友谊，促进经济贸易往来，从而进一步开阔视野，由区域性合作逐步走向全球性合作，越来越自觉地把东盟国家的利益同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前途命运连结起来。正因如此，日本提出的“环太平洋联合设想”，以及日、美、澳等国所热衷的太平洋经济共同体，东盟国家对此兴趣不浓也是很自然的。

### 三

日本的“环太平洋联合设想”提出之后，在太平洋地区引起强烈反响，得到美、加、澳、新等发达国家的热烈响应和积极支持。它们通过官方与民间两条渠道，进行频繁的接触和密切配合，力求以日本“设想”为蓝本，尽早建立起太平洋经济共同体。然而，日、美等国所寄予重望的东盟国家，却对此反应平淡，持以审慎观望态度，与上述发达国家形成鲜明的对比。日本面对这个现实，也只好调整实施其“设想”的方针步骤。即“除继续进行民间协商外，重点放在加强合作上，即加强同东盟的双边合作，通过现有的机构等建立多边的合作关系。”<sup>⑮</sup>

根据这个方针，一九八一年一月日本新任首相铃木善幸打破以往首相上台必先访美的惯例，将东盟国家安排在出访的第一个目的地。在访问东盟期间，在外交上铃木强调对东盟的友好合作是日本“对外政策的基石之一”，把日本与东盟的关系的重要性升格到仅次于美国的地位。在政治上，把日本的命运与东南亚的安全联系在一起，强调日本和东盟是同舟共济的“命运共同体”，要与东盟“想在一起，工作在一起”，并通过经济合作与外交支持，来分担保卫东南亚安全的责任。对柬埔寨问题，日本明确地支持东盟国家所采取的共同立场和政策。在军事上则重申日本不做军事大国，继续“坚持日美安全体制”，接受美国保护。在经济上，注意从东盟国家的需要出发，调整经援方式与合作内容，协助东盟国家“自力更生”地发展农业、建设农村基础设施，发展劳动密集的中小型工业，开发能源与培养技术人员等。

日本的外交姿态与具体措施，无疑对增进双方的相互了解和经济合作确有积极意义，但对促使东盟国家改变对日本“设想”的态度方面，却看不出有明显的效果。结果日本只

好把实施“设想”暂时搁下来。时隔一年半左右，即今年六月，铃木在檀香山的演说中，提出“太平洋团结设想”。日本舆论认为，铃木这个“设想”旨在争取形成“太平洋圈”新秩序。并指出，铃木“设想”与大平“设想”一脉相承。所不同的是，大平“设想”着眼于经济合作，而铃木“设想”则把苏联扩张的忧虑联系在一起，也把安全保障置于考虑之中，所以后者带有政治性。

日本方面透露，铃木在檀香山的这次演讲，是在美国政府、澳大利亚总理和新加坡外长等的“鼓动”下作出决定的。但铃木提出新“设想”以来，却看不到东盟国家有什么反应。相反，联系铃木演讲中的政治性内容以及近一年左右日本等发达国家与东盟国家的关系来看，东盟国家原已存在种种疑虑，现在将进一步加深了。

首先，由于日本在历史教科书中篡改了过去的侵略事实以及增加防卫预算问题，又一次引起东盟国家对日本的强烈不信任感。今年八月下旬在吉隆坡召开的“日本——东盟交流会议”上，东盟国家有的代表指出“教科书问题和日本大力重整军备是同根相连的”，当“日本军事力量强大成为世界上屈指可数的军事强国后，说不定最后把枪口对准东盟。”报道这次会议情况的日本记者说：会上“担心日本增加防卫费和走向军国主义，把日本资本向东南亚扩张同过去的‘满洲国’、朝鲜等地统治的历史联系起来发言的人，在东盟代表中大有人在。”因此，他得出结论说：“日本的名声在东南亚一落千丈”，日本与东盟之间的鸿沟看来“既宽又深”，“甚至使人觉得是难于逾越的”。<sup>⑯</sup>

其次，在经济贸易问题上东盟与日美等发达国家之间矛盾进一步加深。进入八十年代以来，东盟国家受到世界经济衰退和通货膨胀的影响不断加深，经济增长速度减慢、贸易赤字、外汇储备下降等问题日趋严重，为了解决这些困难，东盟国家强烈要求西方经济贸易伙伴给予积极合作，增加对东盟国家的投资和贷款，转让技术，协助发展中小工业。在贸易方面，更是强烈反对发达国家的保护主义措施，要求坚持自由贸易体制，努力向东盟国家开放市场，然而，在世界经济严重衰退面前，西方发达国家首当其冲，自身难保，它们不仅根本无法满足东盟国家的要求，甚至还千方百计将危机转嫁给别人、比如在今年六月中旬召开的东盟外长扩大会议上，“东盟各国集中要求它们的最大贸易伙伴日本开放市场”，但是日本“不能够作出任何具体的对应行动”，<sup>⑰</sup>双方的对话“以各说各的而告终”。所以，东盟国家对其西方伙伴的不满情绪更加强烈。正如出席此次会议的日本外务省亚洲总局局长斋藤所说：“在东盟五国外长会议和外长扩大会议上，完全听不到谴责越南的话，反倒隆重地表明了对于凡尔赛先进国家首脑会议的不信任感。一个‘向保护主义挑战的东盟’鲜明地浮现出来了。对于东盟来说，‘头号敌人’也许已经从河内变成了凡尔赛。”<sup>⑱</sup>（注：凡尔赛会议是在东盟外长扩大会议之前不久召开的一次西方发达国家首脑会议，该次首脑会议着重讨论如何使世界经济回升的问题）。这番话，使人感到东盟国家与西方发达国家之间在经济贸易问题上的矛盾，比数年前更尖锐了。

此外，铃木提出的新“设想”多了一层政治色彩，将会引起东盟国家新的疑虑。铃木在阐述其“太平洋团结设想”时，提出推进该“设想”的五项原则，其中一方面说“美国作为太平洋国家，在政治、经济及安全保护方面，发挥着重大的作用”，日美之间“建立了不可动摇的关系，作为这个地区的重要的安全势力存在着”；另一方面却指出“在这个地区，至今还存在着带来紧张的因素。尤其是，近年来，苏联一直在亚洲、远东方面增强

军事力量，令人不胜忧虑”。⑯把对苏联扩张的忧虑联系起来，同时又将安全保障问题置于考虑之中，铃木新“设想”的政治性就相当明显，这对历来警惕不要卷入大国纷争的东盟国家来说，肯定会产生增加新的疑虑。正如日本报纸所说：“已故大平首相提倡环太平洋设想当时，东南亚国家联盟曾经表示担心说‘这不会是日美勾结起来图谋对本地区进行新的扩张吧？’苏联则表示警惕说：‘这是要建立一个反苏包围圈’，连置重点于经济的大平设想尚且遭到如此大的抵抗，因此，带有政治、安全保障色彩的铃木设想，尽管强调‘开放性’和‘民间主导’，也必定会引起复杂的影响。”⑰

至此，我们可以相应地作出某些结论，对太平洋经济共同体构想进行必要的预测。

第一，“环太平洋联合设想”及太平洋经济共同体等倡议、主张的提出，是同太平洋地区各国经济与贸易的日益兴旺及其具有巨大发展潜力这一客观情况密切联系的。而这些倡议和主张首先来自于这个地区的发达国家，特别是受到日本、美国、澳大利亚等国政府和民间的积极支持和赞同，也不是偶然的。可以说，这是“列强为了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分割世界而斗争的政策”，⑱即与垄断资本利益相适应的“国际政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反映。归根到底，这是日、美、澳等国垄断资本为了确保它们在这个地区范围内的共同利益而采取的共同立场和做法。

第二、由于东盟所处的特定地理环境及其与日美等国紧密的经济政治关系，使它在日美等国推进太平洋经济共同体构想中处于极为重要的地位。但是，东盟国家作为第三世界的组成部分，它们与一般发展中国家有着相同或相似的历史、发展目标和利益要求，这就决定了它们对于来自发达国家的有关倡议和主张，不能不保持一定的警惕性，不能不以审慎、冷静和观望的态度淡然处之。

第三，发达国家虽然对东盟国家寄予厚望，要求与东盟国家携手合作，共同促进太平洋经济共同体的建立，然而东盟国家的态度却反映了双方在兴趣与利益上差距甚大，缺乏合作的必要基础，因此，要使“环太平洋联合设想”等倡议和主张从纸上谈兵变为现实，困难不少，为时尚早。

第四，日本早就把实施“环太平洋联合设想”作为一项基本战略来对待，而且认为要使之实现，“做二十年、三十年这样长期的努力是必要的”，⑲表明长期打算的坚定信念。美、澳等国也已为建立太平洋经济共同体进行过多方努力。因此，它们为了共同的利益，还将会继续采取步骤，互相配合。特别是在促使东盟国家转变态度方面，它们将会采取同步行动。对于东盟国家来说，由于太平洋地区是它们开展政治、经济活动的重要舞台，它们对本地区的发达国家的经济依赖程度还比较高，因此，它们对发展太平洋地区的经济贸易合作还是感兴趣的。如果日美等国能够针对东盟国家的各种疑虑，对症下药，使东盟国家的利益和要求得到充分保证，那么东盟国家最终也将会同日美等国站在一起，向着建立太平洋经济共同体的目标前进。1981年一月，东盟成立由学者组成的半官方组织——“东盟与太平洋共同体问题研究小组”，在其研究报告中主张东盟国家外长和经济部长应正式讨论太平洋共同体设想问题，以便在“形势适应建立一个有政府参加的更正式的

合作组织时，采取主动行动来确定这一设想的组织形式和职权范围”。上述半官方组织的成立与研究报告的主张表明，东盟国家对“环太平洋联合设想”所持的审慎观望态度已有了转机，会后将会变得较为积极主动。

诚然，建立太平洋经济共同体决不仅仅是少数几个发达国家和东盟国之间的事情，而是一件与本地区所有国家都有直接关系，对世界各地区也有重大影响的事情。我国地处太平洋沿岸，在这一地区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我们对拟议中的太平洋经济共同体构想的态度如何，对本地区其他国家将会产生重大的影响。因此，我们必须审慎地制订自己的对策。而要这样做，首先则应改变以往那种漠不关心和袖手旁观的态度，建立相应的机构、组织精干的力量，进行卓有成效的研究，同时还要广泛地同海外有关组织或团体建立学术交流渠道，积极地开展对话活动，务求在较短时间内，能够为制订我们的对策提供有说服力的论据。

#### 注 释

- ①②日本共同社1980年1月16日播发。
- ③④⑪弗·卢金等：《“太平洋共同体”：设想与现实》，苏《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杂志1981年第3期。
- ⑤日本《产经新闻》，1982年6月17日。
- ⑥日本铃木佑司：《东南亚和日本外交的进程》，译文见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资料》，1981年第4期。
- ⑦台湾张剑华《东南亚的变局》，第15页，正中书局印行。
- ⑧《世界经济增刊》，1981年第4期。
- ⑨德新社新加坡电，1982年6月14日。
- ⑩新华社《国际资料手册》，第41页，人民出版社1977年。
- ⑪《国际贸易》杂志，1982年第7期，第22—23页。
- ⑫美国《新闻周刊》，1982年6月28日。
- ⑬马来西亚《星洲日报》，1982年6月8日。
- ⑭日本《读卖新闻》，1980年10月6日。
- ⑮日本《每日新闻》，1982年8月28日。
- ⑯日本共同社电讯1982年6月18日。
- ⑰日本《日本经济新闻》，1982年6月19日。
- ⑱日本共同社电讯1982年6月17日。
- ⑲日本《读卖新闻》，1982年6月17日。
- ⑳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选集》第2版第2卷第798页。
- ㉑日本《外交时报》，1980年3月号第14页。

# 东盟国家初级产品贸易问题

张乃坚

长期以来，东盟五个成员国（不包括文莱）中四个国家——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泰国一向是工业国家的原料供应者，新加坡则一直作为在远东地区对英国服务和其它东南亚国家对外服务的中心。过去10多年，随着工业的迅速发展，东盟五个国家的经济发生了重要的变化。新加坡已变为一个出口现代工业制品和提供金融服务的中心，但是，初级产品的加工出口和转口贸易对于新加坡的经济仍然不是微不足道的，其它四个国家也继续大力加强初级产品的生产和出口。

1980年，印度尼西亚初级产品出口的比重仍占其总出口额的95%；马来西亚占73%；菲律宾占78%；泰国占72%；新加坡占55%（主要是加工出口和转口贸易）。最近几年由于这些国家制造业产品的出口额迅速增长，初级产品出口的比重有所下降，但仍占其总出口额很大的比重。由此可见，初级产品的生产和出口是东盟国家国民收入和资金积累的重要来源，也是外汇和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初级产品的生产和贸易状况的变化，对国家经济影响极大。

东盟国家拥有橡胶、锡、木材和石油等丰富的初级产品资源，其出口对象主要是西方工业国家。美国所需的锡和天然橡胶的大部份来自东盟各国。橡胶占美国同类产品总进口额的89%；锡占68%；硬木28%；石油6%；日本工业用原材料的进口更是高度依赖东盟国家，橡胶占日本同类产品进口额的98%，锡及其合金占96%；木材40.2%（热带硬木99%）；铜37%；铝矾土30%；石油及其制品35%；糖20%。西欧共同体对东盟国家初级产品也有大量需求。东盟国家的天然橡胶占西欧共同体总进口额的10%；锡占6.9%；棕榈油和椰干共占8.5%；锯木占9.7%等等。

## 一、初级产品贸易的不利地位

在现有国际经济秩序的条件下，东盟国家是处于不利地位同工业国家进行贸易的。国际贸易至今仍然是有利于工业国家实现国际间财富再分配的重要渠道。

首先，同其它发展中国家一样，东盟国家能吸收本国所产生的初级产品的国内市场容量非常有限，它们必须向工业国家出口这些初级产品的绝大部分，因此，这些初级产品的价格必然要取决于工业国家经济的繁荣和衰退所造成需求量的变化。其次，工业国家利用代用品的广泛程度、它们的抛售活动和生产这些产品的东盟国家生产计划上的缺陷，是造成这些初级产品价格波动的另一些因素。初级农产品的产量还经常遭到气候反常和病虫害

的影响，致使其价格极不稳定。初级产品一般还具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其使用性能相对不易发生变化。其价格在市场因素影响下起落很大。上述这些因素互相交织的作用使各项初级产品短期价格波幅各不相同，因而也造成东盟国家来自出口初级产品的出口税和出口收入极不稳定。但是，决不能把出口大量初级产品的发达国家与此相提并论，以初级农产品而言，发达国家的生产关系、由生产技术水平所决定的劳动生产率和抗拒天灾的能力，都不是东盟国家所能比拟的。特别是发达国家能适应不断变化的国际市场条件，迅速调整其初级农产品的生产，使之具有较大的供应弹性。东盟国家则没有多少调整其初级农产品生产的回旋余地。因为每一项主要初级农产品都是大量农民生活所系。例如，马来西亚约有300万人亦即占全国四分之一的人口直接或间接依靠橡胶业为生。菲律宾直接依靠椰子为生的居民占全国人口三分之一左右。另一方面，东盟国家依赖从工业国家进口机械设备、化肥等工业制成品来发展经济，工业国家就有可能把通货膨胀引起不断上升的国内生产费用转移到出口价格，导致它们出口初级产品贸易条件恶化的长期趋势。工业制成品因技术经济参数的变化而改善其使用性能和最大限度适应使用条件，无疑也是工业制成品价格提高的重要原因。但需要指出的是，技术经济参数的变化主要体现于工业制成品的部件和原材料之中，原料成本只占最终产品价格的一小部份，单位产品的技术成本随着大批量生产和运用规模经济而缩减。

## 二、石油价格变动和市场供求的影响

**1、石油价格变动对其它初级产品价格的影响** 进入七十年代以后，特别是所谓“原料商品繁荣”的1973—74年，对东盟国家主要初级产品而言，以1970年价格指数为100，除了铜的价格涨幅较小以外，橡胶、棕榈油、椰干、大米、糖、木材、锡和石油的价格都大幅度上升，甚至成倍或几倍暴涨。七十年代初期初级产品国际价格上涨反映了国际间和各国本身政治经济一系列矛盾的发展。首先，资本主义国家的通货膨胀、六十年代末期到七十年代初期的货币危机和不断上升的工业制成品价格，导致已收回石油产销和定价控制权的石油输出国组织成员国实行提价政策。战后20多年来依靠低价石油建立起以重化工业为其产业结构中心的工业国家无法立即改用其它能源，尤其无法为其重化工业获得代替石油的原料。美国、西德、日本和英国等主要工业国家重化工业的原料有80—90%以上来自石油。这种碳氢化合物是目前世界上唯一能为现有重化工业生产提供多种烷族和烯族物质的原料，可用以制造塑料、合成纤维、合成橡胶、合成洗涤剂、化肥、农药和炸药等范围广泛的产品。石油提价是其它初级产品国际价格有不同程度提高的一个重要因素，它使生产成本上升：（一）石油作为目前一种主要工业燃料，对东盟国家除石油以外的主要矿产品生产的影响而言，锡、铜、铝等有色金属的开采、选矿和冶炼的能源消耗，按不同工序的不完全统计，能源成本占锡开采阶段成本的20—25%，1971—79年，剔除非生产性开支，用电铲的砂泵采锡的费用分别增长了1.3倍和1.5倍；铜的开采成本占离岸价成本的40—60%，熔炼加精炼约占离岸价的25%；铝的开采成本虽仅占金属铝成本的10%，但冶炼耗能成本极高，占金属铝成本的60—65%。（二）石油提价必然使东盟国家种植初级农产品橡胶、油棕、椰子、大米和甘蔗等作物所需化肥和农药等投入费用增大，而且对高产品

种还需投入更大量的这些化学制品。（三）各种产品的运销都需消耗机械动力。

2、供求量变化的影响 战后低价石油使西方工业国家建立和发展了能量集约的农业。以美国为首的工业国家不断向国际市场提供“过剩”的低价粮食，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增长率，这些国家落后的农村生产关系和采取形形色色不够重视农业的经济发展模式和战略等等，妨碍着粮食生产的提高。世界反常气候的发生和苏联、东欧某些国家由于农业发展缓慢而大量进口粮食，触发了1972年的粮食危机，粮价剧增，大米价格猛涨了2倍多。

由于世界各国经济的发展，木材、油类和糖的价格因消费量逐步增加而上升，1974年世界食糖产量下降使糖的价格上升幅度特别大。

1979—80年工业国家经济好转和石油价格进一步提高仍然是东盟国家初级产品价格上升的重要原因。粮食和糖的价格同样由于世界产量下降而上升，糖则因减产而增加其价格上涨的趋势。

但过去10年中发生世界经济衰退的1974—75年、1977—78年和1980—81年，按不变价格计算，东盟国家初级产品价格随即疲软以至大幅度下跌。下表列示：

东盟国家几种主要初级产品价格指数的变动

	1970	1971	1972	1973	1974	1975	1976	1977	1978	1979	1980
橡胶	100	80	81	168	178	139	178	189	229	293	350
林产品	100	110	125	184	219	217	245	270	286	360	410
油脂	100	103	102	180	268	185	181	221	234	267	250
稻米	100	98	110	208	329	234	168	124	149	186	220
糖	100	112	162	215	654	445	254	178	174	214	600
铜	100	77	76	127	146	99	113	105	110	160	192
锡	100	96	103	131	221	188	211	300	354	421	480
铝	100	100	91	92	118	136	141	178	203	235	280
石油	100	—	—	194	646	—	—	—	—	1,214	2,040

资料来源：根据苏联《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1981年第1期刊登的《世界价格：问题和前景》一文中表1、5、6的数字编成。这些表的数字是取自《统计公报月刊》，1976年6月号和1980年6月号的资料。

来的最低点，铜和糖都跌到生产成本以下。

七十年代以前的20年间，工业国家制成品的价格上涨了45%，1970—76年上升了87%，在以后几年中继续按9—14.7%的年上涨率上升。

**3、石油价格变动对东盟国家出口收入的影响** 东盟国家当中只有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是石油出口国，其余3个国家都是石油进口国。石油提价使印度尼西亚自1974年以来长期保持贸易顺差，1980年其贸易顺差达85亿美元。马来西亚的石油业于七十年代获得迅速发展，1977年以后石油已成为其主要出口项目之一，1980年石油出口额达20多亿美元。同年，马来西亚为设于本国的外国炼油厂进口中近东含硫量高的石油，支付额约4亿多美元。因此，马来西亚亦可从石油提价获得很大收益。新加坡作为世界第三炼油中心，其石油消耗可从石油的加工附加值获得补偿，石油提价也增加其船舶和钻机的出口订货。但菲律宾和泰国所需石油90%以上要依靠进口，它们都受到由于石油进口额增大造成对外贸易收支的巨大压力。1973年，菲律宾和泰国石油进口额分别占各自进口额的11.7%和11%，1974年石油大幅度提价，菲律宾这一比率增至20.7%，泰国增至19.5%，1980年，菲律宾这一比率增至28.2%，泰国增至30.9%。1981年，泰国进口石油相当于其几种主要农矿产品大米、木薯、橡胶和锡的全部出口收入，占全年外汇收入的41%。

1981年以来世界经济持续衰退和石油价格疲软，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的对外贸易收支已从长期顺差变为逆差。1983年中，石油每桶降价5美元，将使印度尼西亚到1984年4月为止的财政年度贸易逆差达20多亿美元，其液化天然气的出口收入亦受影响，这两者占印度尼西亚政府收入的70%和外汇收入的80%。按1982年马来西亚每天出口25万桶石油计算，这次石油降价将使马来西亚出口石油的收入减少4亿5千万美元。石油降价影响新加坡对印度尼西亚的出口和钻机、船舶的出口订货。对东盟另两个进口石油的国家而言，石油降价使泰国贸易逆差减少。菲律宾则因已和各产油国签订了长期合同而非购买现货石油，其所获得好处少于泰国。但石油降低影响这两个国家对中东出口劳务和商品的收入。1983年，菲律宾在中东地区参加各项工程建设的人数达21.9万人，泰国则达20.1万人。

世界经济经过3年来的衰退，初级产品生产的缩减和库存量的逐步下降，随着美国和其它一些工业国家生产的缓慢复苏，1983年以来，原料产品如铜、铝和橡胶等的价格逐步回升。而石油价格的疲软和下降则成为促进原料产品尤其是有色金属降低成本、并且有助于工业国家消费这些产品的工业部门（如汽车工业）增加对其需求的有利因素。糖的价格则由于西欧共同体减少了种植面积、食糖生产国达成限制产量协议以及消费量略有增加而有所回升。

但是可以预期，在现有国际经济秩序的条件下，东盟国家初级产品的国际市场价格仍将为世界经济的繁荣和衰退所支配。由于工业国家经济衰退的周期日益缩短，其向上波动与稳定的或缓慢下降的长期趋势相背离不能持续很长的时间。

### 三、其它因素的作用

此外，还有一些影响东盟国家初级产品供求关系的因素，但每个因素对每项初级产品